



文镜秘府论研究

下

The Research of Wen Jing Mi Fu Lun

卢盛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文镜秘府论研究

下

The Research of Wen Jing Mi Fu Lun

卢盛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镜秘府论》是日本高僧遍照金刚编撰的一部中国诗文论著作，中国失传的六朝至唐许多重要文献，依靠此书得以保存。本书作者几赴东瀛，入深山，访古寺，又辗转访问于海峡两岸，查清现存版本，完成集大成的四卷本校勘整理著作《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在此基础上，又全面进行理论与考证，成此姊妹篇《文镜秘府论研究》一书。举凡《文镜秘府论》未存和现存传本及其系统和卷次，所收诗文论著作之原典，编撰过程与编撰思想，声韵调声说、四声论、病累说及其渊源，创作论、对属论和体势论，以及其诗学日本化诸问题，无不穷搜冥求，深耕细耘。中心为中国六朝至唐诗学诗律学，而内容所涉，遍及其时之语言学、音韵学、佛学，中印、中日文化交流以及日本考古学和民俗学，立厚实之根基，揽众说之精华，出独立之见解，推秘府之新境，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备书籍。

第八章 《文镜秘府论》声病渊源研究

《文镜秘府论》声病说的渊源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章主要探讨四声来源,探讨四声发现与佛经诵法,与吠陀三声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最早是陈寅恪《四声三问》提出来的。他提出,四声中,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的入声,其余平上去三声,之所以分别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即吠陀依声之高低的 Udatta、Svarita、Anudatta 这三声^①。此说一出,数十年来,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逯钦立、俞敏、郭绍虞、饶宗颐、李新魁,日本的平田昌司等很多学者都发表了意见^②。反对者的意见认为,《吠陀》诵法在印度本土早已失传,六朝时中国僧徒诵读佛经不可能用吠陀三声,佛氏诵经,禁止用婆罗门诵法,且立为戒条。佛教传教,原不用雅言之

① “吠陀三声”之汉译名称,或作高音、低音、混合音(段晴《波你尼语法入门》),或作升调、平调、升降调(裴文《梵语通论》),一作高、低、合(金克木《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收入《梵佛探》)、尖重音、沉重音、高低音混合之元音(饶宗颐《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一四声外来说平议》,收入饶宗颐《梵学集》),高调、低调、过度滑音降调(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收入《俞敏语言学论文集》)。

② 见逯钦立《四声考》,詹鍈《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收入《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郭绍虞《声律说考辨》等(收入氏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饶宗颐《〈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一四声外来说平议》(均收入《梵学集》),李新魁《梵学的传入与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收入《李新魁音韵学论集》),平田昌司《梵赞与四声论》、《中国赞佛诗的起源》、《读陈寅恪〈四声三问〉》。另外,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吴相洲《永明体与音乐关系研究》,陈顺智《沈约“四声”说本于传统文化之四象理论》(《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汉语“四声”之形成与佛经“转读”无关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等也发表了意见。

梵语,而用巴利语,不可能用吠陀之诵法^①。这一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比较复杂,很多细节已难完全弄清,更为细致更为详尽的考证尚有待将来。本章只简单把本人已形成的一些印象陈述如下。

第一节 吠陀三声在印度

本节主要讨论吠陀诵法、吠陀三声在印度的情况。

一 吠陀诵法在印度本土并未失传

吠陀诵法在印度本土并未失传,吠陀三声并未消失。

吠陀吟诵是印度宗教祭祀仪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祭祀是印度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印度教认为,祭祀不仅可以沟通人神,而且其法力可以支配万物,参与和影响整个宇宙的未来,祭祀直接模仿创世事件和大神行为,因而也是人类获得解脱的不可或缺的方法。服务于祭祀的语言是神圣的,梵语的重读音节优美而有规律,吠陀经典的吟咏具有音乐性,遵循一定的规则并使用正确完美的吠陀语言,可以具有魔力,驱使天神。吠陀经典具有无比的神圣性,吟咏吠陀不敢有半点错误,若是祭司不能正确地发音、运用语法,所诵祭文不但不能获得福祉,还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大疏》写下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婆罗门仅仅因为念错了一个复合词的重音,便引来杀身之祸,大神因陀罗杀死了他^②。按照《摩奴法论》的规定,三个再生种姓

① 代表性的意见如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指出,僧律禁止“外书音声”,用外来音声念佛经是犯罪,因此,“说汉人分四声是‘摹拟’和‘依据’声明可太胡闹了。”饶宗颐《印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一四声外来说平议》提出三点疑问:(一)，“当炎汉之际,印度本部,对于吠陀音诵寔已失传,何以六朝时中国僧徒,能转读之”;(二)，“四声创立,实始于刘宋,永明时集沙门所造之梵呗,乃诵佛经之声曲折,与永明之声病说无关”;(三)，“佛氏诵经,禁止用婆罗门诵法,且立为戒条”,佛教传教,原不用雅言之梵语,而用巴利语,间亦用原始东部语言,佛教盛行以后,其经典乃或以梵语写成,与俗语杂糅,遂成为一种混合梵语,其转读佛经,庸有渗用婆罗门方法,“印度本土此种变相之佛教诵音,与《围陀》三声有无关係,已难明了,若乎汉土佛徒转读之方,在《吠陀》诵法失传已久之六朝时代,此三声究竟如何,更无从拟议,遽取与平上去比况,诚难令人肯首”。

② 参尚会鹏《印度文化史》第92—93页,第32页,第46页。段晴《字里行间》,段晴教授赠打印稿。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一生族为首陀罗)都要学习吠陀，尤其是婆罗门，必须每天精勤地记诵吠陀，《摩奴法论》第二章第 157 条说，不诵经的婆罗门，恰如木制的象，又似皮制的鹿，三者都徒有其名。

正因为这样，作为祭司的正统婆罗门一生进行 12 种重要的仪礼，其中之一是入法礼，从师学习吠陀，接受宗教训练。一生划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梵行期”，就是学习吠陀，接受宗教训练，有 12 年之久。从小记诵吠陀经文，以便长大后做祭司或教师，进行宗教仪式。历史上，吠陀经典是靠口耳相传的。吠陀经典内容十分丰富，仅《梨俱吠陀》，就包括 1028 首，10589 节诗文和 153826 个词。正统婆罗门是从 6 岁 8 岁开始诵读经文，凭借儿童惊人的记忆，把吠陀所有的内容背诵出来。这成了一种职业性的行为。这种习俗，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如泰米尔纳德邦、卡拉拉邦，一直延续到今天。直到印度独立前，利用吠陀经文进行宗教仪式仍有很大的市场。直到今天，仍有婆罗门吟诵吠陀，从事宗教祭祀活动。国际梵语学印度学界前几年在印度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就还可以听到婆罗门们为世界各国来的这些学者们用古代的诵法吟诵吠陀经典。吠陀经典和吠陀梵语最早没有文字纪录的文本，到后来才用文字把吟诵文本纪录下来。就是靠这种严格无误的口耳相传的记诵，四吠陀丰富的内容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才有后来的文字纪录文本，才有 19 世纪英国印度学奠基人马克思·米勒完整纪录的两种基本的吟诵文本。尽管流传下来的吟诵文本有数十种之多，有较大差异的文本也有十一种，其中有三种基本的，八种派生的，这样的文本尽管也让人担心，担心它是不是精确地呈现出了原始吠陀吟诵的节奏、音高、旋律、音变，但有一点，基本的吟诵方法保存下来了，吠陀三声保存下来了，吠陀三声并没有消失。后来的文字纪录文本，关于吠陀三声即高音、低音、混合音都有明确的标记。正因为吠陀诵法没有消失，吠陀三声没有消失，正因为四吠陀的文字纪录文本有关于吠陀三声的标记，世界各国的梵语学者们才能据以用吠陀三声吟诵吠陀，并以教授学生。在中国，梵语教授和研究水平最高的北京大学东语系，在他们的梵巴专业教研室，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室，就可以听到音律节奏优美的吠陀吟诵声和吠陀三声。尽管能用吠陀三声的优美音节，用准确而优美的节奏、音高、旋律来吟诵吠陀的人已经不多，但吠陀三声毕竟流传下来了。它并没有消失。不

仅在印度本土没有消失,而且流传到中国,流传到中国现代的大学讲堂。它既然可以在现代流传到中国的大学讲堂,也就有可能在汉魏六朝时期流传到中国,影响到中国六朝时期的佛经转读。

二 吠陀三声与古典梵语的关系

吠陀梵语,吠陀三声与古典梵语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吠陀梵语经历史诗时期演化到古典梵语,无疑有了很大变化。就形态来说,吠陀梵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而古典梵语则相对简单。比如,词干形式,吠陀梵语拥有大量的名词后缀,到了古典梵语时期,却有相当一部分名词后缀消失。古典梵语的格词尾及格范畴也比吠陀梵语简单得多。在吠陀梵语中,复合词的形成有严格的结构规则,古典梵语却没有这样的规则。吠陀梵语的动词变位有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到古典梵语,则简单得多。吠陀梵语有各种动词不定式形式,到古典梵语则简化为一种单一的形式。就句法结构来说,吠陀梵语的前置词位置相当灵活,古典梵语的动词前置词位置则相对固定。时态、语态、语气也有差异,比如,虚拟和命令形式消失。语句主体词也有差异,吠陀梵语以动词居多,而古典梵语以名词居多。就语义和词汇来说,有不少同音异义词,也有大量的吠陀语词没有进入古典梵语^①。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引起人们更多注意的,是并存语言的影响。比如,与印度比邻的语言的影响,比如与印度北部边疆地域比邻的藏缅语,西北比邻的布鲁沙基语。就印度本土来说,现在可以知道,与古典梵语并存并影响古典梵语的主要来自两个语族:扪达语族和达罗毗荼语族。比如,达罗毗荼语通常采用动名词连接词,受其影响,古典梵语也开始更多地出现动名词和连接词。比如,从吠陀梵语衍生出来的方言普拉克利特语,这种方言和古典梵语的并存,出现了古典梵语和普拉克利特语的混合语。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吠陀三声应该也会有变化。在古典梵语中,这三种音调三种音势并不予标出的,它们只有在吠陀经典文本才被标出。古典

^① 参裴文《梵语通论》第十一章。

梵语文献中没有关于三声的直接记录,在语音规则描写中,吠陀梵语采用的是音调系统,而古典梵语则采用了重读系统。从这个意义或者可以说,没有理由认为吠陀三声依然存在,或者可以由此做出一个暂时的主观判断,即吠陀三声在古典梵语中消逝。

但是,梵语中三声应该没有消逝。它应该经过流变或者转换之后以另外的方式进入延伸到古典梵语。我为这一问题专门向北京大学东语系梵语研究专家段晴教授请教,段晴教授说,古典梵语确实不标这三种音调三种音势,但三声是有的。这证实了我的推断。

三声本只是吟诵吠陀的声调。它是吠陀梵语的特征。吠陀经典所用的语言,本来只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通行的语言,从《梨俱吠陀》的地理环境看,这是当时印度北方靠西边的文学语言。金克木《梵语文学史》作过这样的分析,社会发展了,政治形势变了,印度其他地区也正在发展,北方靠东边的恒河流域内兴起了强大的摩揭陀王国,这一带的语言也必然得到发展。到孔雀王朝统一印度时,南方语言也必然发展起来。但是,自然经济毕竟占优势,交通闭塞,统一的文学语言还只是出生在北方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的需要,南方还处于隶属的地位。语言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需要长时期才能提高,社会上层和中层的接触日益频繁,自然会形成一些比较通行的语言。这种新的通行的语言,只能以原来文化比较发达地区所形成的吠陀语言为基础。这一分析是对的。古典梵语正是在吠陀梵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吠陀梵语经过史诗时期的发展而形成的。从吠陀梵语到古典梵语,有了很多变化,但仍有很多元素延伸下来了。特别是语音。从吠陀梵语到古典梵语,梵语语音有一些变化。比如,在波你尼时代(前4世纪), $\bar{r}$ 和 $\bar{l}$ 在实际运用中可能互为同类音,但是到了迦旃延那(Kātyāyana,一译作卡提亚耶纳,公元前3世纪)的时代, $\bar{r}$ 和 $\bar{l}$ 已不属于同类音, $\bar{r}$ 是顶音, $\bar{l}$ 是齿音^①。从吠陀梵语到古典梵语,音素更替有变化,古典梵语以 $\bar{d}$, $\bar{dh}$ 取代了吠陀梵语的 $\bar{l}$, $\bar{l}h$, 以 $\bar{l}$ 取代了吠陀梵语的 $\bar{r}$ 。音变更替有变化,古典梵语以 -y- 和 -v- 分别取代了吠陀梵语的 -iy- 和 -uv-。尾音介入规则有变化,在吠陀梵语中,尾音 s 只能够介入到首音为 t, 尾音为 n

^① 参段晴《波你尼语法入门》第12页。

之间,但是,古典梵语没有这种限定性的描写。人们研究发现,吠陀梵语历经史诗时期演化到古典梵语,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语音方面似乎没有发生相对深刻的变化。古代梵语保持了吠陀梵语的基本语音结构特征^①。在基本不变的语音结构之中,吠陀三声完全应该延伸到古典梵语。

《波你尼经》很值得研究。这部著作清楚地记述了吠陀三声。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的波你尼(Pāṇini)^②所撰写的《波你尼经》(Aṣṭādhyāyī)(一译作《八章经》、《语言结构规则》),这部古印度现存第一部,同时是人类历史上现存第一部语言学论著,应该也是研究吠陀三声与古典梵语关系的重要材料。

这部著作研究的是什么语言?在梵语研究界,有不同的观点。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波你尼所研究的不是已经死亡的语言,而是当时活着的语言。已经有很多权威研究者提出过这种看法。凯斯(A. B. Keith)指出:“波你尼的语法规则只不过是针对本土方言的。当然,他将他所教授的这种言语命名为 bhāṣā,这种言语具有口语的特征。”^③针对本土方言,也就是说,针对的是当时活着的语言,而不是死亡的语言。巴洛(T. Burrow)也指出:“对于波你尼来说,他的研究基本来源显然是他所处时代的活着的语言。”^④伽塔基(Ghatage)也指出:“各项研究资料表明,波你尼的梵语(bhāṣā)与当时的达罗毗荼语文献一致。他一方面把吠陀语中的古语清理出来,另一方面也把日常口语中的粗俗用语清理出来。”^⑤事实也正是如此。波你尼研究吠陀梵语的规则体系以及在这种语言中大量存在的习惯用语和固定搭配。一些难以总结出规律的语言现象也是他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他归纳出可以生成的结构规则,也发现无从归纳、无从分析的语句形式和语词结构。例如,第四章第2.117条规则,第四章第2.118条规则,第四章第1.49条规则,第四章第1.158条规则,以及第四章第1.169—1.173条规则等等,分别就专

① 参裴文《梵语通论》第十一章。

② 波你尼生活年代,据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中T·伯罗撰第十三章“古代和近代的语言”,金克木《梵佛探》、裴文《梵语通论》说同。段晴《波你尼语法入门》以为波你尼大约为公元前5世纪人。

③ A. B. Keith.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9.

④ T. Burrow. *The Sanskrit Language*. 2nd ed. London: Faber & Faber. 1965. P44, P50.

⑤ “Pāṇini and the Veda”, IC. 1936. Vol. 2. P745.

有名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专有名词的使用规律以及个别没有规律的使用规则。第八章第 1.1—1.14 条规则对拟声词构形态和同源词的形成进行了充分的分析,总结拟声词构词形态的规则及其例外,归纳同源词形成的方式及其例外。波你尼对一些语言现象使用的场合做出了分析,即怎样的语言表达适宜于怎样的宗教礼仪,与什么样的人交流应该适宜于用什么样语言,由此,他总结出语言使用的语境规则。他不仅指认了语言意义的最小单位,而且还指认了语境对语词歧义的限定以及对语词意义的单向选择。例如,第八章第 2.83 条规则对致敬语的表达方式及使用语境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第八章第 2.84 条规则对从远处喊话的表达方式以及因言听者的不同而应该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第八章第 2.93 条规则对回答问题的语境及相应的用语进行了详尽的描写;第八章第 2.95 条规则对指责用语进行了归纳和描写。就是说,波你尼所描写的,是他那个时代活生生的语言现象。例如,第六章第 1.158—2.119 条规则,第七章第 1.16—1.74 条规则,以及第八章第 2.4—2.6 条规则等,都对重音以及日常用语的语音和语调进行了多个方面的详尽描写。常见的例证都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比如第八章第 1.2 条规则为例,这一例说:“在直陈式之前,重复使用第二人称祈使形态,表示动作的强度。例如:khāda khādeti khādeti (狼吞虎咽)。”现在的马拉塔语 (Marāṭhi) 仍然保留了 khā khā khāto。《波你尼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波你尼研究的区域变体分布非常广泛,从克什米尔一直到恒河盆地。他自己生活在阿陶克北部的希阿拉图热 (Śaiātura),即现在的巴基斯坦,但是,他对吠陀梵语在维帕希 (Vipāś) 北部地区的词源、构词以及声调等等,对吠陀梵语在旁遮普 (Punjab) 地区非常细微的方言变体,有非常精细的研究。从波你尼的研究成果,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吠陀梵语分布于几乎整个印度—恒河平原,同时也看到吠陀梵语受到这些地区先前语言和共时并存语言的影响。波你尼所研究的语言显然从处来语中吸收了一些词根,并将这些词根融入到本土语言当中。比如,在词根表里,波你尼将词根 *nṛt* 注解为“跳舞,动词”,而将 *naṭ* 分作两个词根加以注释,一个解释为“跳舞,动词”,一个解释为“颤动,动词”。前者显然借自从词根 *nṛt* 派生出来的中印度语词根形式 *naṭ* (跳舞,动词),而后者则是借自达罗毗荼语的词根 *naṭ* (颤

动,动词)。这说明,波你尼研究的语言实际上是吠陀梵语和中印度语移植的综合^①。

如裴文教授所说,吠陀梵语是当时的母语和日常生活语言,也是教学和宗教的语言^②,从现有材料看,波你尼收集材料的渠道有二个,一是文学作品,一是现代口语。波你尼曾进行广泛的游历去收集第一手语言材料,运用谈话和调查的方式探寻事实的真相,了解梵语的真实面貌^③。这都说明,波你尼所研究的是当时活着的自然的语言,而不是人工的语言,死亡的语言。既然如此,这应该能说明,他所研究的吠陀三声也是当时活着的自然的语言,而不仅仅是过去的语言,死亡的语言。波你尼对三声的描写,有些是针对吠陀吟诵的,比如,他说,erasnuti,又名单音调,是向远处呼唤时所用的声调(1.2.33)。又说,吟诵圣典圣歌时绝不能出现单音调,圣歌中元音采用 udātta(高音),而不是采用原应有的 svarita(混合音)(1.2.37)。他说,吟诵圣歌时,deva(天神)和 brahmāna(梵天)二字均用 anudātta(低音)(1.2.38)。这都是直接针对吠陀吟诵的。但是,他还有其他很多论述,比如,他说,高(声读出的元音)是高音(udātta)(1.2.29),低(声读出的元音)是低音(anudātta)(1.2.30),由 udātta 与 anudātta 二声组合的综合音是混合音(svarita)(1.2.31)。又说,若 udātta(高音)在 svarita(混合音)的前部,则

① 以上参裴文《梵语通论》第十七章。在我做这个题目的时候,非常幸运正好得到了裴文教授的这部著作。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梵语的通论性的著作,也是裴文教授在剑桥大学一年时间里完成的四部著作中的一部。剑桥是世界上梵学研究的一个重镇。这些著作,充分利用了剑桥的数据和其他学术条件,当然也充分展示她的才学。在这部著作里,对梵语的基本背景、基本结构原理、历史过程和梵学成就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其中论历史过程,对吠陀梵语的基本语言特征,吠陀梵语与古典梵语的区别,并存语言对古典梵语的影响,梵语的使用,梵语的传播与影响等问题,分析得透彻而精彩。这些分析,反映了国际上梵学研究新进展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很多是第一次在国内发表。我非常幸运能够充分利用裴文教授的这些成果。我还有幸直接得到裴文教授的指教。通过裴文教授,很多问题还得直接向她的导师、剑桥的梵语学专家请教。在我的研究涉及梵学问题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扰裴文教授,向她请教,而她总是那样热情耐心,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一个又一个,几乎是没完没了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解答我的问题,长长的 E-mail 信件,甚至直接就是电话。裴文教授的热情指教,对我研究这一问题帮助极大。

② 参裴文《梵语通论》第十一章。

③ 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volume I . The Early Phases*. 16. Yāskaand Pāṇini (Vasudeva Sharana Agramala, M. A. , PH. D, D. LITT.) (The Ramakrishna Mission Institute of Culture Calcutta. 1993)

占整个韵律长度的一半(1.2.32)。又说,与 *sanhitā* 邻近的单音调会取代混合音(*svarita*)元音后的低音(*anudatta*)元音(1.2.39)。他又说,低音(*anudatta*)元音会替代有一高音(*udatta*)元音紧跟的重音即 *sannatare* 音调(1.2.40)。又说,“缘”(3.1.1),“及在后”(3.1.2),“及首音高”(3.1.3),“*sup* 和有 *p* 作符号的是低调”(3.1.4)。从这几条规则可以知道,声调的高低与后缀有关,所谓“缘”,就是后缀^①。金克木《梵佛探》对这几条规则作了分析,他指出,3.1.3 这一条说,“缘”二音以上,则第一音是高调,接着 3.1.4 补充说,*sup*(名词词尾)和非名词词尾而有 *p* 作符号的,都只是低调。这些描写,不应该仅仅针对吠陀吟诵而应该也针对当时活着的语言,这应该是说明,当时活着的语言仍然存在三声,说明吠陀三声延伸到了当时的语言。古典梵语文献之所以没有关于三声的直接记录,应该因为在语言规则描写中,他们没有采用音调系统,而是采用重读系统。没有记录,没有标记,并不意味着三声不存在。

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波你尼经》不仅描述了当时活着的语言,而且对古典梵语趋于稳定起了历史作用。波你尼时代,婆罗门祭司阶层对上层语言有一种规范化的要求,他们需要规定自己通行的标准语言。《摩奴法论》(*Manu Smṛti*)第二章第 17 条曾说:“介于神河色罗斯瓦底与德利舍特瓦底之间由天神开辟的那个地区,人称‘梵域’。”第 22 条又说:“位于上述两大山之间的从东海至西海的地区,智者们称为‘圣域’。”这一地区,应该就是当时的标准梵语地区,这一地区的梵语就是作为梵语的标准。比波你尼时代较晚约公元前 2 世纪的《大疏》(*Mahābhāṣya*),在解说《波你尼经》6.3.109 条规则时,就说到住在所谓“圣域”(āryāvarta)的几乎无所不能的婆罗门,是能够正确使用梵语的学者,有些构造不合语法规定的词就以他们所用的形式为标准。这一经句中说“依照讲说”(yathopadiṣṭām),这所谓“讲说”者或教导者,就是在“圣域”能正确使用梵语的婆罗门。这一地区的梵语之所以成为标准,是因为这是由于传统而符合婆罗门祭司所规定的礼法地区。《摩奴法论》第二章第 18 条就说:“该地区各种姓和杂种姓中传统

① 以上《波你尼经》关于吠陀三声的论述,转据饶宗颐《印度波你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金克木《梵佛探》和段晴《波你尼语法入门》。

的习俗,被称为‘善人的习俗’。”第20条又说:“大地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向出生于这些地方的婆罗门学习各自的为人。”学习这些地方婆罗门的为人习俗,自然也以这些地区的梵语作为标准。婆罗门祭司阶层依靠所谓神圣的《吠陀》和祭祀以及巫术,靠他们所掌握的吠陀文化而高居社会上层,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之中,在各种语言交流的发展当中,他们要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使自己掌握的文学语言和它所包括的文化以及祭祀与巫术的秘密继续得到保持,当然要求上层语言的规范化。《波你尼经》应该正是反映了当时这种语言规范化的要求。由于资料匮乏,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够确定波你尼研究的梵语曾在哪一个区域使用,但是我们知道,他研究的区域变体分布十分广泛,从克什米尔一直北部恒河盆地。也就是说,波你尼所研究的梵语,应该包括北部恒河盆地,这片地区正是《大疏》(Mahābhāṣya)和《摩奴法论》(Manu Smṛti)所说的“圣域”(āryāvarta)。《摩奴法论》第二章第22条所说的“两大山”,就是指喜玛瓦特山即喜马拉雅山脉和文底耶山,所说的“东海”,就是孟加拉国湾,所说的“西海”,就是阿拉伯海。这个“圣域”就是印度北部平原一大片地区。正是这一地区的梵语作为梵语的标准。这样看来,《波你尼经》所涵盖的,正是当时作为标准的梵语。《波你尼经》是对当时标准梵语的描写,同时也是一种规范。规范语言学的方法是以描写为基础的,而其描写的结果却成为后人使用语言的规范。古代印度语言学家正是尝试以规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并推广语言。他们对经典模板和当时口语进行语音、语法、意义等方面的分析,并以分析的结果作为语言规范。《波你尼经》完成后呈给国王,国王不但高度赞扬此书,而且颁布诏书命令整个王国都要使用此书^①。《波你尼经》实际就成了这样一种语言规范。正如T·伯罗指出的:“他(指波你尼)的语法迅即得到普遍认可,结果是他叙述的这种梵语表达形式便永远一成不变。”^②产生于17世纪婆托吉·迪士塔(Bhattojī Dikṣīta)《本经月光疏》(Siddhāntakaumudī)在解释《波你尼经》1.3.2时曾说:“在原始发音中,带鼻腔音的元音是个术语

① 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volume I .The Early Phases. 16. YāskaandPāṇini(Vasudeva Sharāṇa Agramala, M. A. , PH. D, D. LITT.) (The Ramakrishna Mission Institute of Culture Calcutta. 1993).

② 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T·伯罗撰第十三章“古代和近代的语言”。

符号,被确定为鼻腔音是根据波你尼的教导。”^①这里所谓“根据波你尼的教导”,就是把《波你尼经》作为语言规范。这样的例子在印度后来的梵语语言学著作中不胜枚举。仅靠一部书当然不能定下一种语言的规范,但是,在《波你尼经》那里,文学语言定型了,规范化了,而这种规范得到人们认可,至少,这部著作对古典梵语趋于稳定起了一定历史作用,这一结论是不用怀疑的。它之所以能对古典梵语的稳定起一定的历史作用,是因为它反映了语言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当时语言规范化要求的趋势。既然如此,吠陀三声应该也反映着这样一种规范,吠陀三声作为一种规范,应该也被当时人们普遍认可接受。

要之,古典梵语是在吠陀梵语基础上经过史诗时期的发展而形成的。很多元素延伸下来了,特别是语音方面,没有发生相对深刻的变化,古代梵语保持了吠陀梵语的基本语音结构特征。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波你尼经》清楚地记述了吠陀三声。这部著作所研究的是它所处时代的活着的自然的语言,而不是已经死亡的人工的语言。它所反映的是当时语言规范化的要求,这种规范得到了人们认可。既然如此,波你尼所研究的吠陀三声也应该是当时活着的自然的语言,它应该也是反映一种规范化的要求,应该也为当时人们普遍认可接受。从吠陀梵语到古典梵语基本不变的语音结构之中,作为一种活着的自然的语言,作为一种规范化的语言要求,吠陀三声应该以某种方式延伸到古典梵语。如果有条件对吠陀梵语和古典梵语做出一个声调对比图,或许可以追索到吠陀三声的残存形式。正如段晴教授所说,古典梵语中三声是有的。段晴教授是梵语研究专家,著有《波你尼语法入门》。这是继金克木《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之后国内又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专门研究《波你尼经》的著作。以上我对吠陀梵语与古典梵语的关系的分析可能会有某些不当,但古典梵语有三声,这个推断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 《舞论》与吠陀三声

婆罗多牟尼(Bharatamuni)《舞论》(Nāṭyaśāstra)也有一条材料。《舞

① 转引自段晴《波你尼语法入门》第27页。

论》第十九章 37 节以下,对台词的吟诵方式作了具体规定,指出吟诵有七种音调、三种音域、四种声调、两种语调、六种庄严和六种分支。其中“四种声调”(varṇa)是高调(udātta)、低调(anudātta)、降调(svarita)和抖调(kamṇita),他说:“降调和高调用于滑稽味和艳情味,高调和抖调用于英勇味、暴戾味和奇异味,低调、降调和抖调用于悲悯味、厌恶味和恐怖味。”^①这条材料也值得注意。

这条材料所说的高调(udātta)、低调(anudātta)、降调(svarita),或以为这仅仅是戏剧用语,与吠陀三声是两回事。但我相信段晴教授的看法。这里所说的,和吠陀三声 udātta(高音)、anudātta(低音)、svarita(混合音)应该是一回事。用的语词都一样,都是 udātta、anudātta、svarita。婆罗多《舞论》曾说,首陀罗种姓不能听取吠陀经典,因此请创造另一种适合所有种姓的第五吠陀,也就是戏剧吠陀。戏剧吠陀以四吠陀和吠陀支为来源,“从《梨俱吠陀》中撷取吟诵,从《娑摩吠陀》中撷取歌唱,从《夜柔吠陀》中撷取表演,从《阿达婆吠陀》中撷取情味。”^②梵语戏剧的戏文以诗歌为主,主要以歌唱(或吟诵)的方式表演故事。在梵语中,戏剧,特别是剧本的通称是“哪咤迦”(nāṭaka),“哪咤迦”(nāṭaka)的意思就是以歌说古事,也就是以歌唱(或吟诵)的方式表演故事。梵语戏剧戏文既以歌唱(或吟诵)的方式表演故事,既以四吠陀为本源,从吠陀中撷取吟诵、歌唱、表演,就可能从中撷取吟诵吠陀的三声。古典梵语文学家多数出身婆罗门,既出身婆罗门,他们就应该从小接受吠陀吟诵的教育,就应该熟谙吠陀三声。他们就有可能把吠陀三声运用到他们所创作的梵语戏剧中来。《舞论》第十八章对剧中人物使用的语言种类作了规定。按照《舞论》的说法,梵语戏剧有四类语言:超凡语、阿利耶语、种姓语和兽语。超凡语是天神的语言,阿利耶语是国王的语言,种姓语(jātibhāṣā)是四种姓的语言,分梵语和俗语。兽语是村中家畜、林中野兽和各种飞禽的语言。从现存梵语剧本看,只有所谓的种姓语即梵语和俗语。婆罗多在这一章所作的具体规定,也只涉及梵语和各种俗语。婆罗多规定,坚定而傲慢、坚定而多情、坚定而高尚和坚定而平静的四

① 转引自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② 《舞论》1.12—17,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第36页。

类男主角使用梵语,出家人、仙人、佛僧即释迦的信徒和圣洁的婆罗门使用梵语。王后、妓女和女艺人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梵语^①。在其他地方,《舞论》也不止一处说到采用梵语,如 20.37 说:“支柱插曲应该由中等角色担任,采用梵语。”20.144 说:“女角色身着男装,吟诵梵语,逗乐女友,这称为花香。”22.25 说:“以语言为主,由男角而不由女角运用,使用梵语,由以自己的名称作为称呼的演员运用,这称为雄辩风格。”35.75 说:“在戏剧演出中,多次由他当众吟诵,使用俗语或梵语,这是赞诗吟诵者。”^②梵语戏剧剧中人物使用梵语,当是事实,如,《沙恭达罗》第三幕开头的支柱插曲由一位祭司的徒弟执行,就使用梵语^③。既然剧中人物使用梵语,那么,婆罗多《舞论》所规定的台词吟诵的声调,应该就是梵语的声调,所谓高调、低调、降调,应该就是吠陀三声。婆罗多《舞论》的这一规定,应该反映了当时梵语戏剧台词吟诵声调。也就是说,当时梵语戏剧的台词吟诵,是有三声的。

婆罗多《舞论》说:“听到器乐声、弦乐声和歌声,听到吠陀颂诗,也是这样。”(36.23)^④。从这条材料看,梵语戏剧是有“吠陀颂诗”的,既有“吠陀颂诗”,则用“吠陀三声”是很自然的。当然,梵语戏剧主要是古典梵语,我们现在看到的梵语戏剧,主要是古典梵语。婆罗多《舞论》所规定的台词吟诵的声调,应该既指其中的“吠陀颂诗”,更主要指其中的古典梵语而言。梵语戏剧中的俗语是否也有三声,不敢推测,但其中的古典梵语有三声,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婆罗多《舞论》又说:“在戏剧中使用的语言,应该具有深刻的含义,符合世俗和吠陀,所有的人都能领会。”(27.46)^⑤这里说的戏剧语言符合吠陀,是什么意思?语言的深刻含义怎么符合吠陀?具体所指不太清楚。但我想有一点,即戏剧吟诵语言的声调应该符合吠陀。语言符合吠陀,在声调上就应该符合吠陀三声的特点。如果这一理解大致无误,那么,他对梵语戏剧台词吟诵几种声调的规定,就可以看作是戏剧语言必

① 参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第127—128页。

② 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第77页、第82页、第90—91页、第105页。

③ 参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第106页。

④ 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第107页、第95页。

⑤ 黄宝生译《梵语诗学论著汇编》第107页、第95页。

须符合吠陀的具体说明。

在婆罗多《舞论》那里,高调(udatta)、低调(anudatta)、降调(svarita)之外,还有抖调(kampita),是四种声调(varṇa)。婆罗多《舞论》对台词吟诵方式作具体规定时,四种声调之外,还规定了七种音调、三种音域、两种语调、六种庄严和六种分支^①。关于抖调(kampita),关于声调和他所说的“味”的关系,关于七种音调、三种音域、两种语调、六种庄严和六种分支和吠陀三声的关系,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或者已不是吠陀三声的原貌,或者说明吠陀三声延伸到古典梵语已有了某些变化。古典梵语中三声没有消逝,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如我们前面所作的判断,它可能经过流变或者转换之后以另外的方式进入延伸到古典梵语。梵语戏剧是不标这三种音调的,但三声是有的,婆罗多《舞论》关于三声的规定就是证明。从婆罗多《舞论》关于梵语戏剧吟诵三声的规定来看,这三声在当时应该是一种规范,这与前面我们对《波你尼经》关于吠陀三声论述的分析和所作的推断是一致的。就是说,作为一种规范化的语言要求,吠陀三声确实以某种方式延伸到古典梵语,延伸到古典梵语的戏剧文学作品。《波你尼经》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而婆罗多《舞论》,按照黄宝生的分析,其原始形式产生于公元前后不久,而现存形式大约定型于四、五世纪。这就是说,经由公元前4世纪的史诗时期,再到四、五世纪的古典梵语时期,吠陀三声可能有某些变化,但它毕竟是以某种形式延伸下来了。这一推断应该是有根据的。

四 吠陀诵法与印度佛经诵读

婆罗门诵法,吠陀诵法与印度佛经诵读的关系比较复杂。

我们先看早期佛教的情况。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佛陀确实曾禁止用外道婆罗门诵法^②。但其原因需要具体分析。

① 见婆罗多《舞论》第十九章第37条以下,见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第130—131页。下文另有引述。

② 如《十诵律》卷三八:“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大正藏》第23册第274页)《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佛作是念:‘……若苾刍作阐陀声诵经典者,得越法罪。’”(《大正藏》第24册第232页)义净注:“言阐陀者,谓是婆罗门读诵之法。”